

1999



中国最佳
杂 文

朱铁志 选编

太阳鸟丛书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99 中国最佳杂文/朱铁志选编.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4

(太阳鸟丛书)

ISBN 7-205-04767-6

I. 19… II. 朱…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3046 号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316 千字 印张: 15 $\frac{1}{2}$

印数: 1—6,000 册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陶 然 责任校对: 刘 涛 陈 越

王芳芳

封面设计: 金 明 版式设计: 王珏菲

定价: 22.90 元

目 录

序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者谓我何求 朱铁志

——1999 年中国杂文散论

何满子	所谓鲁迅的“新基调病态”和“局限” (1)
	刍议“管” (4)
	破除迷信要破透 (7)
严 秀	优生学怎么变成了“名利学” (10)
	“东方文明”琐议 (12)
	环境保护与心灵保护 (17)
方 成	武大郎开店 (21)
	我国的知识分子 (21)
	打 假 (22)
	伐木者 (23)
冯英子	国有企业的霸气 (25)
	“我奶奶是慰安妇就好了!” (27)
	与虎谋皮 (29)
牧 惠	焦大与胡适 (32)
	从“自律”到“提醒” (33)
	谈法轮功 (36)
	被遗忘的角落 (38)

	痞子与官痞子	(41)
邵燕祥	谁管谁	(46)
	慎言“闹事”	(48)
	何必改词	(51)
	皇帝热	(54)
	说表演	(60)
谢 云	神圣的一票	(63)
	宪法的故事	(65)
	重读《“老爷”说的准没错》	(68)
	香港的挑战	(70)
舒 展	读钱钟书札记	(74)
	——阴伏、飞钳、飞遁	
	双关语拾萃	(78)
王大海	冬日随感录	(82)
	——关于平庸	
	关于“谱牒学”	(84)
	金奖·一级作家·排行榜	(86)
	——世纪末文坛风景一瞥	
公 刘	“傍黑”与变黑	(90)
虞 丹	漫谈《一袋干粮》	(93)

	哲学家当皇帝	(95)
	《邓子恢传》书后	(97)
李克因	闲话秘书	(100)
	寻常百姓的口袋和小车	(102)
	圣人和贵人杂俎	(105)
	“自疑”——一种很坏的心态	(108)
刘 思	论“走过场”	(111)
	最好立个碑	(113)
黄一龙	动手综合症	(116)
	“秘密报告”随想	(117)
	庐山上的哲学问题	(119)
	两位学者的遗书	(122)
章 明	浩然的确是个“奇迹”	(126)
	明太祖清世宗的共同癖好	(130)
	谈“小人得志”	(133)
	“皇阿玛”喊得好亲热	(135)
王春瑜	月下谁敢追萧何?	(138)
	玫瑰园杂识	(140)
	另一种扫“黄”	(142)
陈四益	谤木的变迁	(145)

	臣的定位	(147)
	“赠君一法决狐疑”	(149)
李国文	屁股的功能	(153)
王得后	且慢可悲	(167)
	洋和尚念经	(169)
	杀人故意与有恃无恐	(171)
阎 纲	学者随笔	(174)
	临终前的忏悔	(178)
吴 昊	下有对策	(182)
李庚辰	破除迷信三题	(184)
	“尴尬事”难煞“尴尬人”	(186)
	——斥李登辉鼓吹“两国论”	
瓜 田	失落了的目的	(190)
	当爷爷与“装孙子”	(192)
	孩子必须立志当工人么?	(194)
符 号	“传媒”杂思二题	(201)
	也释“舆论一律”	(203)
	约瑟夫的成份	(205)
毛志成	说“狂”	(208)
	真可以说“好”极了!	(210)

酆烈山	怎样为陈市长写悼词	(213)
	“明目张胆”何罪?	(215)
	且看北大教授论金庸	(217)
刘友德	北京是谁的首都	(220)
	中国的心病	(222)
朱健国	给“假官”一个机会	(226)
	如果早送防弹衣	(229)
	娜拉的第三条路	(233)
陈小川	正经劝美国同行一句	(237)
阮 直	研究“研究生”	(240)
	被骗者更可恨	(242)
	说说拔刀相助	(244)
	不敢讲“品位”	(247)
叶延滨	早叫晚叫	(250)
	污染调查报告	(252)
吴 非	一句话的小波澜	(254)
	“模范”如是说	(256)
	风 雅	(258)
	抚哭叛徒的吊客	(260)
	共和国不能忘记	(262)

乐 朋	“赖莎同志”姓什么？.....	(264)
王乾荣	“别人的事情”	(267)
	无意识“杀人”	(269)
	虚实品级制	(272)
蒋元明	多余的卢员外	(275)
	时间能抹去一切？	(276)
甲 乙	开会观风景	(279)
刘绍楦	“精神贿赂”与“精神腐败”	(282)
	天下第一奇计	(284)
安立志	闻重修开封府有感	(287)
	过时的“剪刀”	(289)
冯日乾	戚继光的无奈	(293)
	出“羊”相	(295)
	作假与作孽	(297)
	“黠者”与“惭者”	(300)
郭庆晨	“负贡献”举要	(303)
邓高如	解读匿名信	(306)
沙叶新	人类的健康	(309)
梅桑榆	假大空先生传	(312)
	读书人四型	(315)

	提前进入共产主义	(317)
陆士华	尴尬之境	(320)
	流行歌曲注释	(322)
张心阳	被删去的真话	(326)
	崇尚愚蠢	(328)
	“小说家”勃烈日涅夫	(332)
刘洪波	“官民”	(335)
	谁的利益	(337)
	“庸俗共产主义”	(339)
	什么是政府威信	(341)
	被遗忘的公理	(343)
赵 牧	马屁的类型	(347)
	猪尾巴文化	(349)
	“头破血流主义”	(352)
童志刚	记忆为什么变得茫然?	(355)
焦国标	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358)
	国味与人味	(360)
	道德双轨制	(364)
祝 勇	苍凉的回眸	(367)
	禁欲时期的爱情	(373)

	批评与眼色	(381)
张金岭	一曲“开明专制”的颂歌	(385)
	——《雍正王朝》批判	
	别轻薄了“人”	(387)
	狂妄与荒谬	(389)
杨庆春	从谬误中咀嚼出真理	(392)
	为何不肯服罪	(395)
	人权与特权	(399)
	反省“奇迹”	(402)
徐怀谦	论狂狷	(406)
	非常的温情	(409)
潘多拉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慌	(412)
	可惜?可恶!	(415)
	你是“疯儿”我是“傻”	(418)
李建永	武二郎开店	(422)
徐 列	因何“勇敢”	(425)
骆 爽	假如我老而不死	(428)
	腐败竞技场	(429)
	——闲话当代的韦小宝们	
盛 晨	对付舆论五字诀	(433)

	爱问“为什么”	(435)
一 文	官道研究	(438)
余 杰	伟人志向与百姓横祸	(441)
	90年代红宝书	(443)
朱铁志	“小阿庆嫂”	(446)
	“吃孩子”	(448)
	世纪末的奇特精神现象学	(450)

所谓鲁迅的“新基调 病态”和“局限”

所谓“新基调杂文”，亦即杂文只能以“歌颂”为基调而不宜“批判”的高论，从80年代前叶出笼以后，就立即遭到了广大杂文作家的斥责。人们只知道这种高论的立论根据十分权威，盖溯源于40年代的一种大声反诘：“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这反诘的意思是：鲁迅式的杂文笔法已经过时，应该递进历史博物馆了。从此以后，关于鲁迅式的杂文是否合宜的论争一直拖拖拉拉地反复出现，不过不像“新基调杂文”说的主张者那样彻底、集中而已。

新近才吃惊地被告知，“新基调杂文”的始作俑者，原来竟是鲁迅自己。是“鲁迅后期感染的‘新基调病态’，带来一场历时半个世纪的杂文的悲哀”。（朱健国：《本世纪中国杂文之我见》，刊《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五期）

这一令人大吃一惊的发明的论据何在呢？文章说：“杂文的本质是我手写我心的独立思想。这种独立思想，即不听命权贵，也不事事代表什么反对派在野派的利益，而是一种超越党派、团体的独立意见。它既不是为了推翻当政者，也不是为了建立新王朝，纯粹是一种对人性、对社会的独立思考。”作者的意思没有周作人《老人的胡闹》一文那样对鲁迅怀有敌意因而明白地说出：“老人的胡闹并不是一定在守旧，实在却在于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趁时，若只因其新兴有势力而拥戴之，则等是投机趁时，一样的可笑。”但所指的是鲁迅后期同情和支持共产党，不“超党派”，因而不“纯粹是一种对人性、对社会的独立思考了”，其精神实相仿佛。因而，文章进而说：“鲁迅精神，主要指青年鲁迅的自由独立批判精神”，后期则是“病中鲁迅”，“感染‘新基调病态’”了。

超党派、超团体，纯粹是对人性、对社会的独立思考，很

好。但只有不食人间烟火，对世事置之度外，在书斋里发空论才办得到。无须用理论来析述无人能“纯粹”得起来，只要凭我们这一代，也就是70岁以上的中国人的亲身经历，就可以说明问题。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要灭亡中国，民族有沦为殖民地的累卵之危，除非你木然无知，或闭上眼睛，人人都要卷入救亡的历史漩涡中去，没有别的选择。国民党政府残民媚外，共产党号召抗日，请文章作者设身处地拿个主意，是何去何从呢？最近读了韦君宜的《思痛录》，她自述也是因为民族危亡之际，共产党抗日，才参加共产党的。文人之中，除了懵懵懂懂溺于小我得失者；或为保全首领，夸夸隐遁以观变者等等，能对时局漠然无动于衷外，都不能在生死关头装死躺下。“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将选票投给抗日力量，为之奔走呼号，是对民族救亡大业竭精效忠。如不是这样，鲁迅就不配担承“民族魂”的庄严称号了。

抗日革命的阵线里也有污秽阴暗，高明如鲁迅能不洞察情弊吗？他还身受其荼毒，即他所陈诉的处于“横站着作战”的苦境。但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只得忍辱负重，委屈以顾全大局，“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今天看来，鲁迅在许多方面还在背黑锅，那曲折隐忍地非常人之所能任，其景况大致包藏在鲁迅后期的文字特别是泄露在他的书简中。鲁迅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而又兼顾处事的经权，当触及原则问题，忍无可忍时，他断不让步，那“义”形于色的雄姿，充分表现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这一掷地有声的名篇中。

鲁迅后期的杂文升腾到一个更高的阶位，收在《且介亭杂文》诸编中的《病后杂谈》、《阿金》、《题未定草》等扛鼎力作，哪个杂文家只要能写出一篇，就堪千古不朽。竟然能说

后期的鲁迅是“病中鲁迅”、“感染‘新基调病态’”，真不知从何说起！

这篇说鲁迅后期是“病中鲁迅”的文章作者接着指出了鲁迅的“局限”：“关键在于他当年对于苏俄革命的全盘赞同，奋力歌颂”。文章作者也原谅鲁迅“预见不到斯大林的真相，预见不到苏联的发展和结局，是因为在当时不可能知道全部真相，不可能弄清一切内幕秘闻”。文章作者没有要求鲁迅是未卜先知的算命先生或未来学家，不能像90年代的我们那样看到历史大白后的真相，得以事后诸葛亮似地指点江山，应该说是平恕之词。但又来了一个“但是”，说：“作为一个思想家，一个学者，一个杂文家，特别是作为中华民族魂的代表，他是否可以根据中外历史规律而预测苏俄的发展，从而对这新生事物的呐喊有所保留，有所警钟（原文如此）呢？以他的胆识才智，完全应该是可以的。可惜他没有。”云云。

所悬鹄的确实很高，可惜是装有现实绝缘器的书斋中的高论。当时的现实是，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威胁着全人类的命运，世界文明的代表人物如罗曼·罗兰，自称“隐士文人”的A. 纪德都寄希望于苏联，后者“转向”而一度参加法国共产党，向希特勒提抗议书。这两位都曾去苏联游历，纪德的《从苏联归来》（1936年）说了一些对苏联不满的话，但鲁迅生前不及见到。罗曼·罗兰的日记有隐讳的微词，死后50年才发表，前苏联的史料远未解秘。真相不明，何所据而判断？

要说“中外历史规律”，则共产主义和大同理想，历来就为志士仁人所向往；至今这种理想也仍有强大生命力。问题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制度和操作。人类社会从未有过实现这

种理想的有规模的试验,有一个国家标榜这种理想,为何不可赞同之,歌颂之?受尽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人,从孙中山起,就对“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致赞词,提倡“以俄为师”。尤其是,作为“民族魂”的鲁迅,当时民族的第一任务是抗日,日、德、意法西斯轴心当时虽然尚未正式缔结,而“预测发展”,趋势显然。不奢谈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即以中国抗日的要求,燃眉之急也迫使鲁迅不能不倾向和法西斯势力敌对,从而也和大敌日本军国主义敌对的苏联。何况当时蒋介石政权事事效法德、意的独裁,切肤之痛的现实刺激也不能不使鲁迅作出如此的选择。不论苏联内情如何,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对付日本侵略,也只得如此,别的问题待救子急以后再说,何况鲁迅不知内情呢?

鲁迅是踏踏实实地站在中国的土地为中国的命运而奋斗的人,他考察问题只能就民族命运的利弊作出判断,而不能站在云堆里看世界。要说“局限”,乃是中华民族的局限,甚至是世界文明的局限,怎么能苛求鲁迅?

滑稽戏演员演《滑稽空城计》,有台词责怪司马懿道:“司马懿呀司马懿,你为何不派人坐直升机侦察一下西城的虚实啊?”要求3世纪的人使用20世纪的器械,其性质正与指责30年代的鲁迅知道90年代的事一样。

选自《学问》1999年第1期

多议“管”

是1980年吧,赵丹辞世时,对文学艺术问题发了一通

议论,算是他对这个世界的临别赠言了。他追述往事,感慨系之地说,对文艺事业,上头不宜管得过死。有那么点主张“无为而治”的意思。那时两个“凡是”虽已谢幕,但还有点,怎么说呢,积习难移吧,一位颇权威的人士斥道:他临死还放了一个屁,云云。

事实是,历史很清楚,50年代起管呀管的愈管愈紧,最后管出了个只剩八盘样板菜和一个小说厨子的局面。说赵丹放屁的人分明是自己在闭着眼放屁。幸亏是这以后管得较少了,或管得较得当了,有了点宽松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应该说比此前三十年的文艺现象有很大的起色。虽然,繁荣挟混乱同来,但比舆论一律的年代究竟大有生气。即使人们抱怨这抱怨那,作品数量总是相当可观了,给了读者以选择余地,不必硬咽强喂给你的“高大全”了。据说去年一年,光长篇小说就出了2000部;不管这些小说的含金量如何,按照数量里出质量的规律,总有几部能成为文化积累留得下来吧。再说,有声音总比悄没声儿的沉寂好。

咱们再来谈谈“无为而治”。说明白了,无为而治也是一种治法,即管法。无为,其实是无不为,也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换句话,该为则为,不该为则不为,为得合理,为得到位,为得为者潇洒而被为者舒服。这才叫高明的领导。“领导”和“管”可以同义,也有微妙的区别。人多事杂的社会事业都要领导,领导是顾全局,依事物的规律,掌握分寸,还得协合群情;管,则管得不当便是管头管脚,察察为明,按主观爱憎办事,于法无据,也就是长官意旨定局。“管”瘾一大就成为苛察,往往庸人自扰,近乎生事,势必把文学艺术管得走投无路,和希望把事业推向兴旺发达的“领导”大异了。若要问恶果的例证,仍然是那句话,只要看上文所说的50年

代至“文革”的历史即知。

说起来又是常识，文学艺术的本性是绘写现实又要超越现实的精神创造，背离了真实就不会有生命力。要制文学艺术于死命非常容易，只要管得你不敢讲真话。那绝招就是舆论一律。历史证明，那真是管死文学艺术的“一帖灵”。那幕戏的最后一场是理论性的“评法批儒”，也即是鼓吹和实施不依法或无法可依的“法家”统治。要是真正依法办事的“法家”统治，倒还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为而治”。何以故？一切都按宪法、民法、刑法以及各种法规办事，上下都不逾规越矩，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就是自由空间，咱们谁也不干犯谁，岂非等于“无为而治”了？“无为而治”是黄老御世之法，据司马迁说，法家的要本也出于黄老。法家在运作中溺于苛察，是违背黄老的“不悖市尘”的宗旨的，一旦背离了一切以法为准绳余事不问的“无为”，搞起苛察和法外峻刑来，管得太凶，就天下汹汹，百姓无所措手足，越法的法家也大概要作法自毙了。

以上是略带点形而上的今古历史慨叹，如今是“俱往矣”了。眼下是推行依法治国，依法治文学艺术当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又是诚所谓积习难移，虽然不再舆论一律也没法做到舆论一律了，但并不违法的言谈也并非能畅通无阻。特别是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方面的言谈，于法无据即长官意旨式的阻扼还是时有所遇。所以说是长官意旨，以作者的经验，可以从“地区差价”上说明问题。往往一篇文章，这个城市的报刊发不出，但改寄到另一个城市却能照登不误。那就是说，在同样的统治下，后一城市依法办事，而前一个则越法而管得过多过苛。这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经验，恐怕相当普遍，至少在我的熟人中很多人遭遇过，